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2005~2015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2005~2015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编

责任编辑：王紫微 智 朴

责任印制：梁秋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5~2015 /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010-4314-9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概况—中国—2005~2015 IV. ①K203-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7339号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5~2015

编 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出版发行 文物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网址 <http://www.wenwu.com>

邮箱 web@wenwu.com

制版印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9×1194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0-4314-9

定 价 300.00元

本书版权独家所有，非经授权，不得复制翻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2005~2015》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刘曙光

副主任

张廷皓 孟宪民 马清林 侯卫东 许 言

委 员

孙 波 丁 燕 李宏松 于 冰

乔云飞 赵 云 詹长法

统 筹

孙 波



序

八十年前，北京城头阴云密布，战争的阴霾时时笼罩在人们心头。为避免承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北京文物古迹、建筑遭受战争涂炭，在袁良、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秦德纯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奔走呼吁之下，国民政府组建了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有计划地组织开展对北京城的大范围建筑测绘和文物修缮工作。在此后的七十年间，从“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到“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再到“中国文物研究所”，我们的机构名称虽几经变迁，但以保护和传承国家文化遗产为己任的情怀始终如初。我们的专业人员进行了大量文物资料收集整理、文物古迹调查研究及文物修缮保护工程工作。他们的成绩，在《中国文物研究所七十年》一书中已经进行过系统总结与陈述，故不在此赘言。

时光荏苒，我们已经在上一次回眸之后又跨过了一个十年。2005~2015年，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快步发展繁荣的关键十年，是中国文物研究所及现在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深化改革、稳定发展的十年，也是我们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队作用、服务全国文物工作重心和国家文物局工作大局能力提升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我们组织主持了一批技术难度高、社会关注度广泛、旷日持久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国家队的能力、勇气和担当。经过多年研究、监测和病灶分析，由我院编制的《应县木塔严重倾斜部位及严重残损构件加固方案》已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复，这一拖延了二十年之久的木构建筑维修工程终于进入实施阶段。经过八年努力，我院完成国家石质文物保护的“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维修工程，使得这一历经千年岁月、早已百病缠身的佛教艺术精品重现昨日风采。我们花费了十年时间积极推动并主持大运河遗产水文、地质、文献、考古等方面的综合调查与基础研究，使大运河从一个概念模糊的文物成为定义明确、内涵丰富、界限清晰的线性文化遗产，为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和理论框架。在维护稳定、反分裂斗争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我院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新疆库木吐喇石窟揭取壁画保护修复，西藏哲蚌寺、大昭寺壁画抢救性保护修复，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大业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经过七年的大胆探索和艰苦实验，我院组织实施的吉林集安高句丽墓葬壁画原址保护工程在壁画信息提取和数据库建设、本体保护技术、防渗水技术、保存环境监测与控制等方面均取得突破与创新。被国内文物

保护界普遍认为是大难题的山东定陶汉墓保护设施工程、广东“南海Ⅰ号”船体及出水文物的现场保护等国家文物保护重点项目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介入后也渐有起色，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此外，我院正在紧锣密鼓调查策划的川渝地区石窟及石刻保护专项，将成为国家文博事业“十三五”规划中的重点项目。

过去的十年，我院积极配合国家外交大局和“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开展文物援外工程，展现了作为文物保护中国队的实力和精神风貌，为中国文物工作者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经过十年努力，我院完成了中国政府第一次实施的文物援外工程——柬埔寨吴哥古迹周萨神庙保护修复工程。目前，由我院承接的中国援柬二期工程——茶胶寺保护工程也已完成大部分工作任务。经过二十年的磨合和发展培育，我院在柬埔寨暹粒的茶胶寺工地，已成为国际社会援助保护修复吴哥古迹行动中最活跃、最富有生气、成果最显著的工地。在商务部和国家文物局支持下，我院完成了中国政府援助乌兹别克斯坦花刺子模州历史文化遗产修复项目的可行性考察报告和立项建议书，为中乌文物交流贡献了一个精彩的开门红；并与蒙古国有关机构合作，开展了蒙古国科伦巴爾古塔抢险维修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与塞浦路斯、伊朗等国积极探索未来合作领域；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韩国国立文化财研究所先后联合举办五次“中日韩建筑遗产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我院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德国考古研究院、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法国远东学院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了我院的基础建设和学术建设，不断扩大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里的中国影响。

过去的十年，我们着眼文物保护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国内文物保护专业人才需求为导向，成为全国文物修复人才的重要培训基地。我们依托中意两国政府签署的中意合作《支持和加强中国文物研究所修复培训中心》谅解备忘录，先后合作举办了60个培训项目，累计培养了包括出水文物保护、化学清洗、现代检测分析技术、壁画和泥塑文物保护、纸质文物保护、考古发掘以及文物行政管理等各类急需专业技术（管理）人员1282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学员遍天下，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培训教学实践中，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培训、修复、科研三位一体，坚持“以修带培”“以培助修”，帮助学生积累了

宝贵的实际动手经验，已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培训特色与优势。

过去的十年，我们强化软科学成果对文物保护管理决策科学化的支持力度，初步彰显了作为国家文化遗产政策理论研究等领域“智库”的作用。我们率先在文博系统组建整合专业文物政策与理论研究队伍，开展了“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文物产权研究”“《文物保护法》执行情况调研”等综合性的政策与理论研究工作，组织编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开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操作指南》预研究、编制完成并发布《长城保护维修工作指导意见》和《长城“四有”工作指导意见》等，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步形成了以关注文化遗产的政策、理论、法律、社会各维度的综合特性为主要方法的科研特色，为相关制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我们以服务和服从于国家文物局中心工作为己任，承担起了“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文物保护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职能。

过去的十年，我们在失去先机的形势下奋起直追，初步形成在世界遗产保护、研究、申报、管理、监测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我们全力完成了“云南哈尼梯田”“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和管理规划的编制，随着两处遗产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不仅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申遗经验，更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内涵、管理机制、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等方面有了深刻思考与认识，形成了一支专业素质较高、年轻而富有实干精神的申遗团队。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我们完成了预警系统国家平台建设，初步搭建起以总平台功能模块、监测数据和指标体系、预警信息与处置、监测业务流程与功能等为内容构成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总平台，为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管理、监测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2009年开始，我们着眼国家大局，勇于担当，把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放在重点建设、优先发展的地位，努力开创中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我们以“担海内重任、作天下文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驱动，排除种种干扰，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完善法规建设、开展重点区域水下考古调查、推进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科研与国际交流合作，初步探索建立起了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新格局。同时，培养建立起一支讲政治、顾大局、守规矩、有纪律、团结一致、甘于奉献、勇挑重担、拼搏进取的专业工作队伍，并最终培育出了“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这个统领全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总平台”，在我院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过去的十年，我们以列入首批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为契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决而稳妥地推动各项改革措施：我们在“以院为先、以所为重、以人为本”的前提下，坚持“按绩取酬、多劳多得、优劳优得、统筹平衡”的原则，实施绩效工资考核分配制度改革，基本打破了以往存在的“铁饭碗”“大锅饭”，初步达到了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的效果，激发了业务人员的工作活力，形成了良性竞争氛围；我们通过部门、机构的优化重组及首次岗位聘用工作，更加突出专业技术人员在我院的主导地位，大幅削减职能部门数、中层干部职数和行政管理岗位数，初步建立起一支业务精湛、群众基础好、具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中层干部队伍；我们加强以文物保护工程项目成本核算工作为核心的财务制度建设，向管理要效益，年工程项目收入由698.03万元增长至8711.87万元，增长12.5倍；以推进院“电子院务工程”为抓手，我们新颁布和修订了58个规章制度，规范和细化项目过程管理和质量监督，向管理要质量；我们顺应形势发展，敢为行业先，组建了“北京国文琰文物保护有限公司”，利用市场机制来整合资源和力量，在创建文物保护样板工程和重大项目实施、培养复合型的文物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和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年来，我们坚持以“实际需求导向，重点领域突破”的科研基本原则和“以项目产生课题，以课题带动研究，结合文物工作和文物保护的实际需求开展科研工作”的应用性科研模式，通过拓展人才引进渠道、实施青年人才培养计划、推动业务人员基层锻炼实践培养，有效锻炼和培养了一批业务强、学风好的中青年业务骨干，初步打造了我院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大遗址保护管理、石质和岩土文物保护加固、金属文物及海洋出水文物保护等跨学科、专业化的创新团队。

十年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领导班子先后经历了三次更替。在国家文物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先后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创先争优”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教育活动，院领导班子建设得到加强，民主决策能力得到提高，团结、务实、创新、发展的工作干劲更足。十年来，在国家严控编制机构数量、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大背景下，国家文物局通过种种途径对我院机构、编制、职能、职称等各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我们的人员编制由117人上升至123人（岗位数量155个），硕士以上学位人员比例由28.13%上升到61%，副高以上职称人员由28.13%上升至

53.4%，行政工勤人员由7.29%下降至0.42%，人员结构得到优化，人员素质与业务能力明显提升，先后有25人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十年来，我院先后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先进单位”（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玉树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先进集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国资委、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先进单位”（文化部颁发）等荣誉，我院主持的文物保护项目亦多次获得“全国十佳文物维修工程”“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等荣誉。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发挥文化遗产学科建设中的引领作用、文化遗产政策法规制定中的智库作用、文物保护关键技术和材料研发推广中的平台作用、文物保护规划设计和施工中的示范作用、文化遗产人才培养和教育宣传中的基地作用方面仍有较长的路要走，在建设法治单位、发展“勤谨务实、知行合一”的院文化精神等方面，也还存在许多不足，需要我们在下一个十年不断努力。回眸过去，我们衷心感谢国家文物局党组，感谢国家文物局机关、国家文物局直属单位、全国同行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我们坚信，通过全院职工努力奋斗与热情参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一定能更好地成长、进步，并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劉曉光

2015年5月30日





中国文化



中国文

产研究院



究所



2008年2月，何鲁丽（左，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孙家正（右，时任文化部部长）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揭牌



2009年9月，蔡武（右，时任文化部部长）检查指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



2009年9月，蔡武（左，时任文化部部长）和单霁翔（右，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为“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揭牌



2015年，文化部部长雒树刚（右）检查指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



2009年，单霁翔（右，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在顾玉才（左，国家文物局副局长，时任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陪同下检查指导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



2015年，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左一）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检查指导工作



2010年，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董保华（中）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玉树抗震救灾文物抢救保护工程现场召开工作会



2008年2月，张柏（时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主持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揭牌仪式